

试论舟形灶

陈杰¹ 石荣传²¹

(1. 中国海洋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山东 青岛 266100;

2. 湖南大学岳麓书院 湖南 长沙 418002)

【摘要】: 汉晋墓出土的舟形陶灶分布较广，以淮河及长江下游的江浙皖赣地区为中心，广泛见于北至鲁南，西到湘鄂西部，东南至海的广大区域。其延续时间较长，有些类型一直沿用到宋代。各种类型的舟形灶均有特定的分布区域，随着时代的推移，逐渐向外传播，其中最为典型的B型和C型舟形灶，南移趋势明显，这与历史上的人口南迁有较大关系；而具有岭南文化因素的D型灶则向附近的江西和福建扩散。江淮之间的苏皖地区出现了A型、B型和C型舟形灶的较早类型，不排除这里是舟形灶发源地的可能。

【关键词】: 舟形陶灶 江淮 传播 人口南迁

【中图分类号】: K878.9 **【文献标识码】:** A

舟形灶，也称船形灶，因其平面形状前方后尖，类似船形，故名。但因为形制的些许差异或命名习惯，有的报告称之为三角形、鞋形、靴形、腰鼓形、酒瓶形等等，不一而足。主要流行于淮河及长江下游的江浙皖赣地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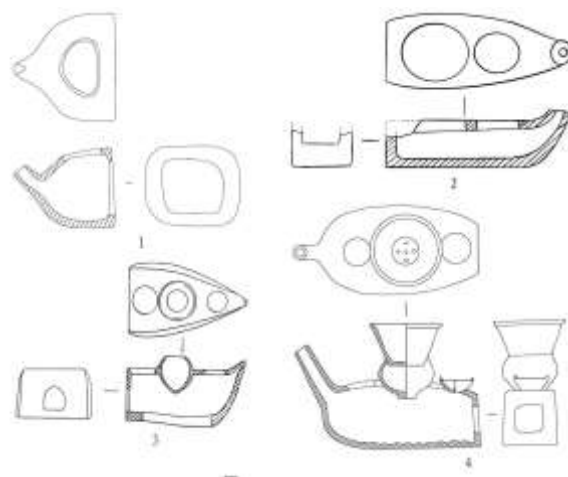
一、考古出土舟形灶的型式分析

A型：有底。灶尾收敛成管状烟囱，上翘明显。灶门不落地。灶身横截面为矩形。

根据灶身長宽比、长高比及火眼数量可分为以下三式。

I式：灶身粗短，长宽比相近，单火眼较大。浙江龙游东华山M11：54^[1]，后端设短而上翘的柱形烟囱，前端有较大的方形灶门。长13、宽12、高9厘米（图一：1）。江苏常州恽家墩西汉中期墓M26^[2]，浙江安吉上马山西汉中期墓M9^[3]也出有本式陶灶。龙游东华山M11所出原始瓷甗、陶盒是浙江西汉早期墓中的常见器物^[4]，常州恽家墩M26出土陶盒、陶甗、硬陶罐、印纹陶甗均与上海福泉山西汉中期前段的同类器物相似，并出有西汉早期的陶釜。安吉上马山M9出土陶鼎、盒、壶与上海福泉山西汉早期墓出土的III式鼎、盒、II式壶均十分相似。由此可见，I式灶主要流行于西汉早期至中期。

作者简介：陈杰（1972-），男，中国海洋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汉唐考古、陶瓷考古。
石荣传（1977-），女，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战国秦汉考古。



图一//A 型舟形灶

1. I 式灶（龙游东华山 M11：54）2. II 式（湖州杨家埠 D3M2：22）3. III 式（杭州老和山 M88：29）4. III 式（杭州大观山果园 M7：9）

II 式：灶身加长，长宽比和长高比明显增大，长高比约在 2.5：1 以上，很多超过 3：1。多火眼。浙江湖州杨家埠 D3M2：22^[5]，灶尾烟孔呈圆柱状上翘。长 24.8、高 8.8 厘米（图一：2）。本式灶流行于西汉中晚期，尤其集中于西汉中期偏晚的阶段。

III 式：灶体长度变化不大，但高度增加明显，长高比约在 2：1 左右。灶面平直或微上拱，多火眼。杭州老和山 M88：29^[6]，灶体较宽，三火眼，尾部上翘为烟孔。长 29、宽 14.6、高 13.4 厘米（图一：3）。杭州大观山果园 M7：9^[7]，弧背灶面，三火眼，后端烟囱呈圆筒状上翘，方形灶门。长 27.5、宽 13.5、高 15.5 厘米（图一：4）。III 式灶常见于江浙地区西汉晚期到东汉早期的墓中。浙江杭州老和山 M87 与 M88 并穴合葬，M87 的时代为西汉中期偏晚，M88 打破了 M87 南壁，且 M87 随葬品中鼎、盒、壶、甗组合完整，而 M88 中则未见陶鼎、盒，说明 M88 晚于 M87。M88 出土的陶壶与龙游东华山西汉晚期墓 M12 所出陶壶相似，陶甗与安吉上马山 M11 相似，M88 时代定为西汉晚期为妥。III 式灶的流行时段应为西汉晚期到东汉早期。

B 型：无底。前方后尖，平面呈标准船形。灶身横截面为矩形。双火眼或三火眼。后端有烟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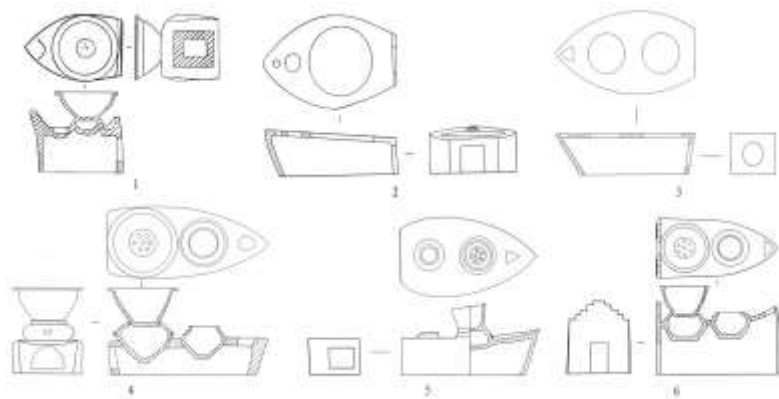
根据灶身長宽高比及灶墙的变化可分为以下五式。

I 式：灶体粗短，长宽比较小，灶面平直，前后壁竖直，多单火眼。安徽泗县前李西汉晚期墓 M3：3^[8]，灶身外弧，长方形灶门，灶后端略高于前端，后壁置倾斜式实心烟道。长 17.6、宽 12、高 12 厘米（图二：1）。本式灶多见于皖中及浙江的西汉中晚期墓。

II 式：灶面平直或后端渐高，灶身较宽，灶体粗短，两侧壁外弧明显，单火眼或双火眼。浙江奉化白杜南岙 M205：16^[9]，灶身中部外鼓，双火眼，长方形灶门，后有烟孔，长 57.2、宽 19.2~36、高 14~18.6 厘米（图二：2）。出土 II 式陶灶的墓葬数量较多，杭州老和山 M72 既出有本式陶灶，又同出 A 型 II 式灶，而 A 型 II 式灶流行于西汉中晚期，本式陶灶的时段应相距不远。II 式陶灶西汉中期就有少量出现，流行于西汉晚期到东汉早期。

III 式：灶面平直，灶身矮，宽度变小，灶体修长，长宽比多在 2：1 以上。两侧壁外弧减小，后壁向内倾斜。后有烟孔或烟囱。南京建安二十四年龙桃杖墓 M2：7^[10]，双火眼，半圆形火门，后有椭圆形烟孔。长 32.8、宽 14.4、高 17.6 厘米（图二：4）。

浙江湖州小塔山 M3：3^[11]，双火眼，圆形灶门，三角形烟孔。灶面刻划交叉线多道。长 28、高 7.6 厘米（图二：3）。湖南衡阳兴隆村永元元年（91 年）墓^[12]、浙江安吉天子岗永和二年（137 年）墓^[13]、奉化白度熹平四年（175 年）墓^[14]、安吉高禹熹平五年（176 年）墓^[15]等纪年墓均出有本式灶。江苏丹阳宗头山汉墓出土一件铜灶^[16]，造型与本式陶灶完全相同，同出的错金银地铜带钩中有铭文“永元十三年五月丙午日钩”，永元十三年即公元 101 年。这些纪年墓主要集中于东汉后期。



图二//B 型舟形灶

1. I 式（泗县前李 M3：3）2. II 式（奉化白杜南岙 M205：16）3. III 式（湖州小塔山 M3：3）4. III 式（南京建安二十四年龙桃杖墓 M2：7）5. IV 式（嵊县大塘岭 M104：7）6. V 式（南京郭家山 M12：15）

浙江德清黄泥墩 M33^[17]也出土有此式灶，墓中出土的釉陶弦纹罐与龙游县东华山 M28^[18]、余杭义桥 M50^[19]出土的陶罐形制相同，杨金东将义桥编号 M50：6 的釉陶罐定为 A 型 III 式，划入第四期，即新莽时期^[20]。刘波则将东华山 M28 出土陶罐划入第五期^[21]，即新莽前后。黄泥墩 M25 出土的硬陶甕、带腰檐的罐形熏炉与浙江杭州大观山果园 M7 出土的同类器完全相同。大观山果园 M7 的时代则在新莽至东汉早期。由此可知，III 式灶在新莽时便已出现，流行于东汉中期。

IV 式：灶形变小，灶身缩短，灶台逐渐变矮。灶面多斜直，后端增高，尾部上翘。前壁上端出现挡火墙，后壁向内倾斜。浙江嵊县大塘岭 M104：7^[22]，双火眼，灶尾有三角形烟孔，长方形火门。长 27.3、宽 15.4、高 14.1 厘米（图二：5）。湖北鄂城吴黄龙二年墓（230 年）^[23]、安徽南陵麻桥吴赤乌八年（245 年）墓^[24]、江苏南京仙鹤山赤乌十年（247 年）墓^[25]、浙江嵊县大塘岭太平二年（257 年）墓、江苏金坛吴永安三年（260 年）墓^[26]、浙江萧山永安四年（261 年）墓^[27]、浙江常山晋太康八年（287 年）墓^[28]等纪年墓出有本式灶。可见 IV 式灶流行于三国西晋时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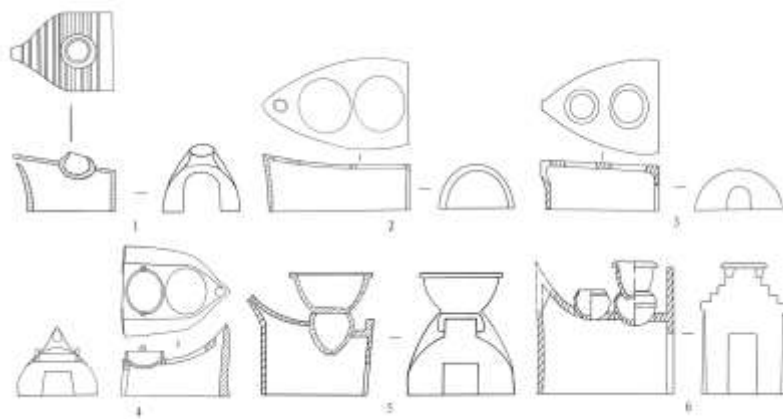
V 式：东晋南朝。灶墙高大，灶身较高。南京郭家山 M12：15^[29]，双火眼，尖尾上翘，有三角形烟道，长方形火门，上有梯状挡墙。长 28.8、宽 14.8、高 16.8 厘米（图二：6）。V 式灶出土数量较少，目前所见均出于南京，如郭家山东晋泰和六年（371 年）墓，淳化咸墅刘宋元嘉二十二年（445 年）墓^[30]等。V 式灶流行时段应为东晋南朝。

C 型：无底。前圆后尖，灶身横截面为半圆形。

根据灶身長宽比、火眼数量及有无灶墙可分为以下五式。

I 式：灶身粗短，多为单火眼，灶尾上翘。安徽灵璧大李西汉末至新莽时期墓 M5：5^[31]，灶面前低后高，单火眼，长 15.2、宽 13.2、高 9.6 厘米（图三：1）。本式灶主要出土于皖北，如灵璧孟山口西汉晚期墓^[32]，淮北渠沟 M50^[33]，萧县张村西汉晚期墓 M7^[34]，宿州夹沟 M4^[35]，固镇圩里西汉晚期墓 M17^[36]等。淮北渠沟 M50 的发掘报告根据铜钱和铜镜判断其时代为东汉早期。根

据其陶器组合和形制来看，时代可能稍早。尤其是墓中出土有带腰檐的陶鼎比较特别，这类陶鼎还见于灵璧大李 M4、山东微山县墓前村 M3、阳谷县吴楼 M1^[37]，时代最晚的是在王莽时期，渠沟 M50 还是定在王莽时期较为合适。因此，I 式灶的流行时段应为西汉晚期至王莽时期。



图三//C 型舟形灶

1. I 式（灵璧县大李 M5：5）2. II 式（庐江董院 M128：7）3. III 式（衡阳新安乡 M11：2）4. IV 式（南京江宁上坊 M1：35）5. V 式（邳州煎药庙 M4：41）6. V 式（南京隐龙山 M3：8）

II 式：灶身加长，双火眼，灶身前低后高，部分灶面前端出现挡墙，烟孔在灶面之上。安徽庐江董院新莽到东汉早期 M128：7^[38]，三火眼，长 28、宽 15.8 厘米（图三：2）。流行时段为王莽时期到东汉早期，在湖南地区可晚到东汉中期。

III 式：单火眼灶增多。灶尾渐趋平直，前后端高差不明显，甚至后端低于前端。多有灶墙，后有烟孔或烟囱。湖南衡阳新安乡 M11：2^[39]，灶面弧形，后部略高。双火眼，后有烟孔。长 26、前高 8.5、后高 9.5 厘米（图三：3）。襄樊杜甫巷 M2^[40]也出土一件本式灶，报告中认为其时代为东汉早期，但其出土的双牛鼻耳罐、编号为 M2：7 的陶仓、II 式圈、II 式井与襄阳城东街东汉晚期墓^[41]出土的同类器物（Ab 型 II 式陶罐、A 型 I 式井 A 型 II 式仓、A 型 II 式圈厕）相同，时代似应稍晚。且出土本式陶灶的墓葬除此一例以外，均为东汉中期。因此，本式陶灶流行时段为东汉中期。

IV 式：灶形逐渐减小，灶身粗短。灶面斜直，尾部上翘明显，尖部有烟孔。后壁内收呈倾斜状。出现低矮灶墙。南京江宁上坊 M1：35^[42]，双火眼，灶尾尖状上翘，尾端有圆形烟孔。长 30、宽 20.8、高 16.8 厘米（图三：4）。湖北鄂城吴黄龙二年（230 年）墓^[43]、湖北武昌吴永安五年（262 年）墓^[44]、江苏溧阳吴凤凰元年（272 年）墓^[45]、浙江安吉西晋太康六年（285 年）墓^[46]、杭州太康八年墓^[47]、嵊县太康九年墓^[48]、平阳西晋元康元年（291 年）墓^[49]、临安元康三年墓^[50]、江苏句容元康四年墓^[51]、江苏吴县元康五年墓^[52]、江苏江宁元康七年墓^[53]、南京石闸湖永宁二年（302 年）墓^[54]、南京殷巷永兴二年（305 年）墓^[55]、南京迈皋桥永嘉二年（308 年）墓^[56]、浙江绍兴永嘉七年（313 年）墓^[57]等纪年墓均出有本式灶。时段集中于三国西晋。

浙江富阳乌龟山 M3^[58]亦出有此式灶，报告认为此墓时代为东晋末年，主要理由是墓中发现“太康十年”（289 年）和“元熙元年”（419 年）纪年砖。此说甚为可疑。

首先，墓中同出的两种纪年砖年代跨度太大。虽然有后代墓利用前代墓砖的可能，但此墓墓砖的形制、花纹相似，甚至连大小尺寸也很相近，年代却相差 130 年，难以理解。

其次，墓中出土器物具有典型的三国西晋特征。墓中仅出土青瓷灶、狗圈、鸡笼三件器物。其中灶的形制与南京狮子山西晋墓^[59]、句容元康四年墓、江宁元康七年墓出土的陶灶几乎一模一样，就连火门下方的缺口都出奇地一致，釜甑的形制、组合也完全相同。同墓出土的鸡笼在南京石闸湖永宁二年墓、南京殷巷永兴二年墓都有发现，同式狗圈在浙江金华太康二年（281 年）墓、平阳元康元年墓、句容西晋元康四年墓、吴县狮子山元康五年墓、南京殷巷永兴二年墓、浙江绍兴官山岙西晋墓^[60]均有出土。同样形制的狗圈、鸡笼均出于东吴西晋墓中，尚无一例出现于东晋。出有此式陶灶有纪年的墓葬最晚的是西晋永嘉七年（313 年），之后此式灶消失不见。墓中所谓“元熙元年（419 年）”已经晚到 100 多年以后，此式灶又突然出现，也不合常理。因此笔者以为，纪年砖上所谓的“元熙元年”应为“太熙元年”（290 年）之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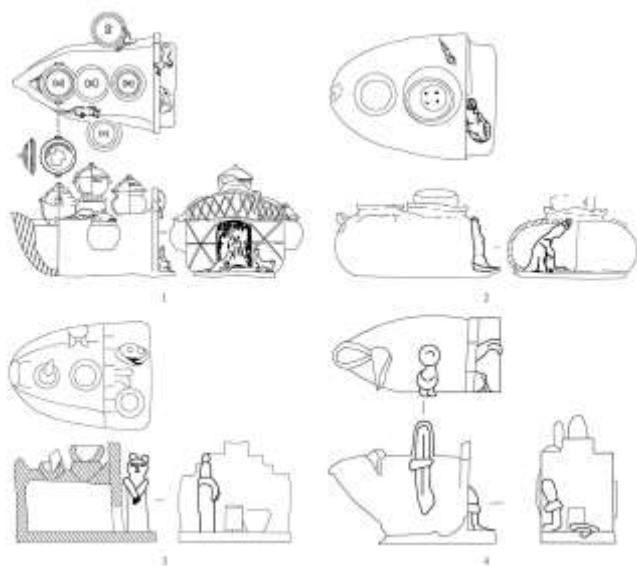
V 式：灶身变高明显，灶尾上翘不明显，有阶梯状灶墙，高大。后期流行单火眼。江苏邳州煎药庙 M4：41^[61]，前有挡墙，后有扁圆形烟道，长 20、宽 17、通高 19 厘米（图三：5）；南京隐龙山 M3：8^[62]，双火眼，长方形灶门上有阶梯状挡墙。长 20.5、宽 13.5、高 14.5 厘米（图三：6）。浙江嵊州祠堂山天监三年（504 年）墓^[63]也出有同式陶灶。除个别墓可早到西晋中晚期外，大多为东晋南朝时期。

D 型：有底，前带地台。根据灶身長宽比和地台变化可分两个亚型。

Da 亚型：灶身相对粗短，地台上多有人俑、狗俑。截面大致为半圆形。根据灶身長宽比、灶侧附属物和灶墙变化可分为以下四式。

I 式：器身较长，长宽比较大，多为 2：1 以上，多火眼。尾部尖翘或有较短烟囱。广州 M5080：58^[64]，后端尖状翘起，三火眼纵列，灶身左右壁各附水缸一口，旁有俑作舀水状。地台有俑看火，一狗蹲立门边，一鼠在灶面，一鼠在额墙。长 43、高 23 厘米（图四：1）。I 式灶发现较少，目前仅见于湖南长沙^[65]和广东广州两地。高至喜认为这种灰陶质“前平后尖、两侧带弧形的三角形双眼灶”（即本型 I 式灶）在东汉早期就已经出现，在广州则出于东汉后期墓中。

II 式：灶身加宽，渐显粗短，尾部上翘不明显。广州沙河顶西晋墓^[66]出土陶灶，尾有烟突，双火眼置二釜一甑，甑旁塑一老鼠，灶口有一妇女往釜底添薪，长 22、宽 17 厘米（图四：2）。沙河顶晋墓出土有刻有“太熙元年”（290 年）字样的铭文砖。



图四//Da 型舟形灶

1. I 式（广州汉墓 M5080：58）2. II 式（广州沙河顶西晋太熙元年墓）3. III 式（政和 M54：9）4. IV 式（吉水房后山 M2：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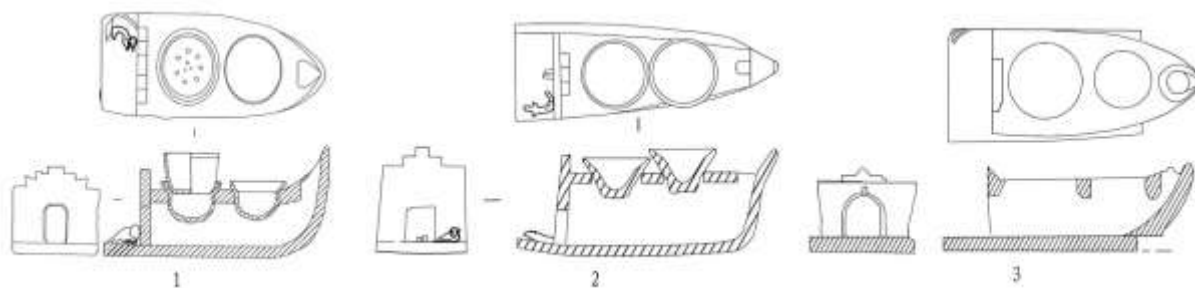
III 式：灶身粗短明显，灶墙高大。地台较宽，有的延展至灶身两侧，地台上常有劳作俑、狗俑及瓶罐等。福建政和凤凰山 M54：9^[67]，整体较短，尾翘，前有山字形挡墙，长方形火门内有火钳，火门右置一罐，左侧和灶旁各有一梳髻妇女。长 12、宽 9.7、高 8.9 厘米（图四：3）。本式灶出土较多，如江西赣州官村营齐建武四年（497 年）M4^[68]，樟树经楼陈至德二年（584 年）墓^[69]、永修马口梁天监九年（510 年）墓^[70]，福建建瓯木墩梁天监五年（506 年）墓^[71]，江西吉水房后山隋开皇二十年（600 年）M11 及 M5 等。可见，III 式灶主要流行于南朝，隋代还有发现。

IV 式：灶身变窄，后部下端内收明显，单火眼，灶墙变小，制作粗糙。江西吉水房后山 M2：6^[72]，单火眼，凸字形挡火墙，长方形火门内塑两根泥条，旁有一罐。灶旁立一妇人双手捧蒸煮器。灶尾有椭圆形出烟孔。长 11、高 7.9 厘米（图四：4）。墓中同出纪年砖铭为“开皇廿年”，即公元 600 年。

Db 亚型：灶身修长，地台规整。截面为矩形。

根据灶身长度和灶墙变化可分为以下三式。

I 式：灶身较长，长宽比较大，侧壁微弧，阶梯状灶墙相对矮小。尾部上翘明显。地台上常有狗俑、人俑。福州翠湖山庄 M1：3^[73]，地台上侧卧一狗，后有圆形烟孔，双火眼。通长 29、宽 11、高 9.4~12 厘米（图五：1）。本式出土数量较多，主要见于泉州北峰梁承圣四年（555 年）墓^[74]，惠安曾厝村隋开皇十二年（592 年）墓^[75]，晋江吕厝唐墓 M1^[76]、紫帽园坂村唐墓^[77]，永春金峰山唐永徽二年（651 年）墓^[78]等。其中晋江紫帽园坂村、吕厝出土的青瓷器符合磁灶窑址唐朝中后期器物特征。本式灶应流行于南朝中晚期至隋唐时期。



图五//Db 型舟形灶

1. I 式（福州翠湖山庄 M1：3）2. II 式（福州仓山区 M1：19）3. III 式（永安南坑口北宋墓）

II 式：灶身长宽比更大，尾部无明显上翘，侧壁平直，地台上偶有陶狗，不见人俑。福州仓山区 M1：19^[79]，前有山形挡墙，尾部有出烟孔，双火眼，地台上蜷卧一狗。长 19.1、宽 4~7、通高 7.7 厘米（图五：2）。福建安溪后垵唐墓^[80]，福清龙田唐墓^[81]也出有本式灶。安溪墓地伴出有乾封二年砖，福清龙田墓中伴出有开元通宝。此式灶应流行于唐代。

III 式：灶面平直，尾端不上翘，挡墙较小。地台上已无陶俑。福建永安南坑口^[82]出土陶灶，双火眼，下有地台，通长 28、宽 12、高 9.4 厘米（图五：3）。

从造型上看，B 型和 C 型灶是最为典型的舟形灶，其出土数量最多，分布区域最广，二者平面形状大致相同，只是灶身横截

面一为矩形，一为半圆。A 型灶出现时间最早，形制上带有明显的早期特征；D 型灶则是一种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类型。

二、舟形灶的时空分布

舟形灶分布范围主要在长江和淮河流域，以苏浙皖分布最密集，湖北、湖南、鲁南也有一定分布。不同形制的灶分布地域也有差别。

A 型灶西汉早期就已出现，是出现最早的舟形灶，一直贯穿于整个西汉时期，东汉初期以后逐渐消失不见。总体数量不多，主要分布在江淮之间及苏南浙北地区（图六），这可能是舟形灶的起源之地。I 式灶见于江淮之间的盱眙、六安及江南的苏州、常州、安吉、龙游等地，II 式则主要见于淮河流域的泗阳、天长及江南的常州、湖州、杭州等地，后来其分布区域向南收缩，III 式灶则主要出现在江南的苏南浙北地区，江北地区已经很少见。

B 型灶是最为典型、延续时间最长、分布地区最为广泛的舟形灶之一。它出现于西汉中期偏晚，一直延续到东晋南朝时期。其分布遍及淮河、长江流域，北至山东，南到福建，西到峡江地区，但以江淮东部为主要分布地区（图七）。

早期的 I 式灶零星分布于浙北和淮河流域，之后向苏南和江淮地区扩散，在环太湖流域数量增加较快，III 式陶灶出土数量最多，分布也最广，但以苏南浙北最为集中，江淮之间还偶见，淮河以北已经罕见。两湖地区出现稍晚，多为东汉时期。即使是同式灶，两湖地区也要晚于浙江及江淮地区，如 II 式灶在江淮地区出现在新莽至东汉早期，而两湖地区一般则要晚至东汉中期才出现，表现出明显的滞后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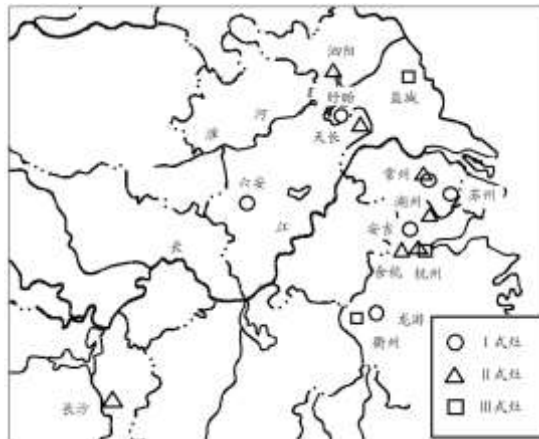
河南地区出土的 B 型灶不是典型的、前方后尖的舟形灶，其灶后端多呈现圆弧状，这可能受相邻的关中地区马蹄形灶影响。从形制上看，河南地区的此式灶兼具舟形灶和马蹄形的特点。其 I 式灶为单火眼，II 式灶多为双火眼，这与江浙一带 B 型灶的发展规律相同。不同的是，浙江地区的 III 式灶延续了多火眼的趋势，而河南地区的 III 式灶却又出现了单火眼，中原地区的马蹄形灶、长方形灶都有这种现象，当不是偶然。

C 型灶与 B 型灶一样属于最为典型的舟形灶，流传区域广，时代延续长。它集中分布于以徐州为中心的鲁苏皖交界地区，在舟形灶中其地理分布最北，后期主要分布于江苏、浙江地区及两湖地区（图八）。它从西汉中后期出现，一直延续到东晋南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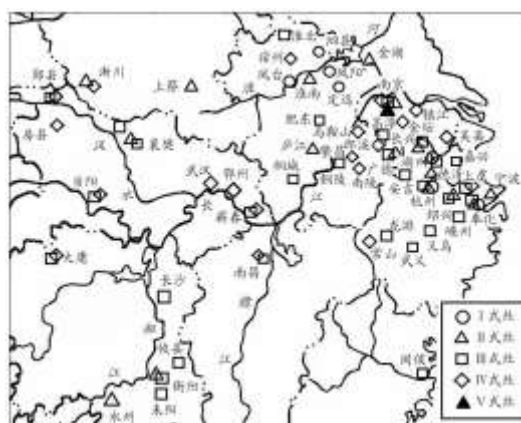
早期的 I 式灶出现于皖北地区，II 式灶已经扩展至邻近的苏北、鲁南地区。东汉中期以后，III 式灶开始出现在南方，主要是两湖地区，但其灶形特点却与鲁苏皖地区的陶灶有些许不同。两湖地区的 III 式灶灶身修长，双火眼，灶面前低后高，无灶墙；鲁苏皖交界地区的 III 式灶灶身粗短，单火眼，灶面平直，多有灶墙，灶墙上有的有树形纹。III 式灶在浙江地区发现数量极少，但 IV 式灶却在浙江盛极一时。V 式灶数量较少，目前仅见于浙江地区。C 型灶南移的趋势较为明显。

D 型灶主要分布于现江西、福建地区，其中 Da 亚型主要分布于现江西境内（图九），Db 亚型则主要分布在福建境内（图一〇）。虽然出现时间较晚，但延续时间最长。在江西地区可以到隋代，而在福建则一直延续到宋代。其分布很有特点，Da 亚型 I 式、II 式灶发现数量较少，主要分布于广东境内，而 III 式灶出土数量较多，主要发现于江西境内的赣州、新干、樟树、高安、南昌、永修等地，主要沿赣江分布，IV 式灶也主要见于江西，数量较少；而 Db 亚型主要分布于福建境内，I 式灶发现较多，主要沿闽江和沿海分布，闽北的政和、建瓯正当由浙入闽的要道，这里出土了数量较多的 I 式灶。II 式灶则主要发现在以泉州为中心的区域，III 式灶已深入福建内陆山地，这与外地移民入闽的进程是相符合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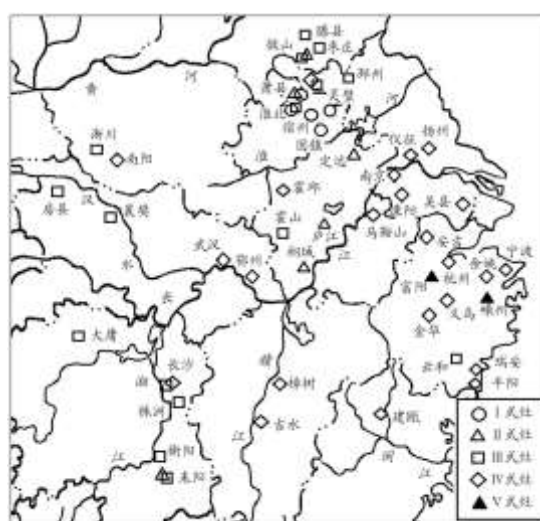
D 型陶灶在福建主要集中于以建瓯为中心的闽北地区、以福州为中心的闽东地区及以泉州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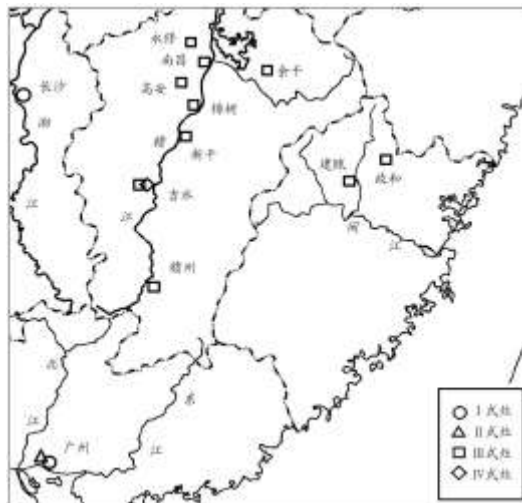
图六//A 型灶分布示意图



图七//B 型灶分布示意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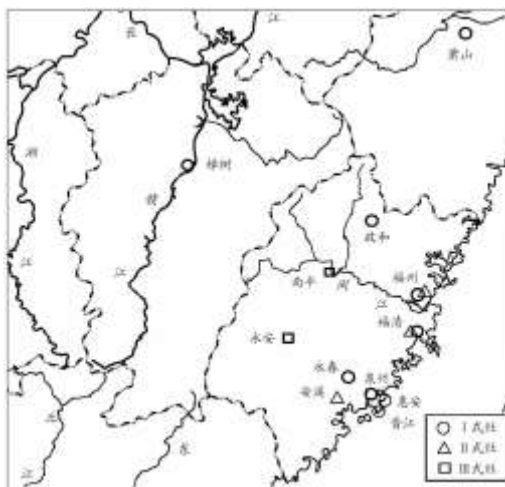
图八//C 型灶分布示意图



图九//Da 型灶分布示意图

D 型灶是唯一在舟形灶流行的核心区域——淮河及长江下游地区不见的灶形。这种下有地台、上置陶俑或明器的做法，在岭南地区十分常见，且不只限于灶，陶井、陶仓、畜圈、陶俑上均有，带有地台的陶井属于“汉代岭南文化因素”^[84]，两广地区的陶瓷俑“多采用数人与马、犍共载于一托板之上的表现方式，这种表现方式尚不见于其他地区”^[85]。可见这种带地台的模型明器是岭南地区较有特点的器物，带有浓厚的岭南文化因素。

但最早的 D 型灶却见于湖南长沙。陶灶至迟在汉武帝灭南越以后就已经在岭南地区出现，但岭南地区流行的是带地台的长方形灶或梯形灶，舟形灶出现得比较晚，数量也极少。而湖南地区却是舟形灶分布的重要区域，上述四型舟形灶在湖南都有发现。因为地理上的便利，湖南地区自古便是中原汉文化进入岭南地区的重要通道，“从西汉中期开始，越式风格的陶器在长沙汉墓中出现，其影响扩张至湘中一带”^[86]。这种下置地台的做法也影响了湖南地区的陶灶。正是受到了中原文化和越文化的双向影响，带有地台的舟形灶至少在东汉早期便已出现在这里。而 D 型灶在广州的出现，应是湖南地区反向影响的结果。东汉晚期以后，D 型灶就不见于湖南，而在广州地区，两晋时期还可以见到，江西、福建地区更是到了南朝以后才大量出现，其地台上置陶俑的做法明显受到广州地区的影响。



图一〇//Db 型灶分布示意图

舟形灶在西汉早期就已经出现，属于出现较早的灶形，延续时间也较长，大多数灶型一直延续到六朝时期。东晋南朝以后，随着模型明器的葬俗日益式微，陶灶在中原地区墓葬中出现的概率逐渐降低，但舟形灶在东南地区却仍然流行，隋唐时期才逐渐减少。而其中的D型灶甚至延续到宋代依然可以见到，延续时间之长是其他灶型所不常见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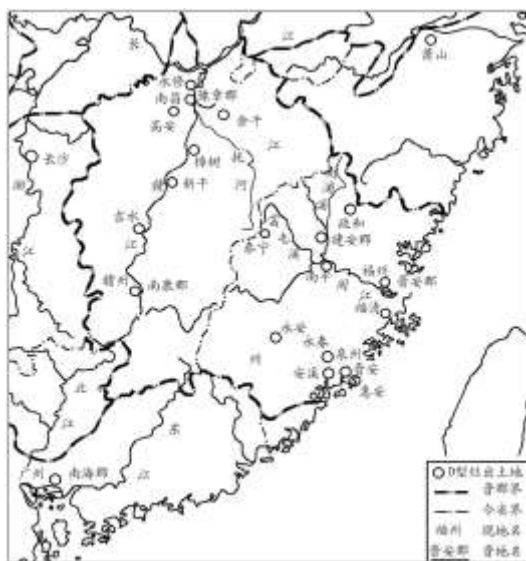
从舟形灶分布范围来看，几乎均为传统上的楚地。《淮南子·兵略训》载：“昔者楚人地，南卷沅、湘，北绕颍、泗，西包巴、蜀，东裹郢、邳。”楚地的疆域以现在的两湖地区为中心，包括河南大部、山东南部地区，江苏、安徽、浙江、江西、陕西、四川、重庆的一部分，幅员广阔。楚国故都原本在郢（今湖北江陵），秦将白起灭郢后，公元前278年，楚顷襄王东迁至陈（今河南淮阳），楚考烈王十年（公元前253年），又迁都于钜阳（今安徽阜阳）。公元前241年，再迁寿春（今安徽寿县），几次迁都在淮河流域。江淮地区乃至黄淮地区南部，都与荆楚文化有着重要的关联。

到了汉代，情况有所不同，《史记·货殖列传》中载：“自淮北沛（今江苏沛县）、陈（今河南淮阳）、汝南（治今河南平舆）、南郡（郡治今湖北潜江西北），此西楚也……彭城（今江苏徐州）以东，东海（郡治今山东郯城）、吴（今江苏苏州）、广陵（今江苏扬州），此东楚也……衡山（郡治今湖北黄冈）、九江（郡治今安徽寿县）、江南、豫章（今江西南昌）、长沙（郡治今湖南长沙），是南楚也。”^[87]《汉书·高帝纪》注引孟康《音义》称：“旧名江陵（即南郡）为南楚；吴为东楚；彭城为西楚。”^[88]西楚约当今淮水以北，泗、沂水以西；南楚北起淮、汉，南包江南；东楚跨江逾淮，东至于海。

秦末农民战争中，从陈胜吴广到刘邦项羽，均为楚人，而刘邦建立的大汉王朝，其帝王将相亦以楚人为多，是以在汉文化中楚风盛行。随葬陶灶是汉文化的葬俗，但有着典型江南风格的舟形灶却在楚地遍地开花。苏南浙江成为舟形灶分布的中心，几乎所有类型的舟形灶在此都有发现，而最为典型的舟形灶，即B型灶和C型灶，在此出土数量最多，分布区域密集，这是其他地区所无法相比的。

另外一个地区亦无法忽视，即以徐州为中心的苏鲁皖交界地区，是西汉楚国所在地，是C型灶最重要的分布地区，且时代相对其他地区要早，它可能是C型灶的起源地之一。

值得注意的是，舟形灶分布的北界，在今鲁南枣庄一线，即司马迁所说的“胸缙线”：“胸（今江苏连云港）、缙（今山东苍山西北）以北，俗则齐”，即此线以北为齐俗，以南则为楚俗。可以说它是楚文化的北界，同时也是舟形灶分布的北界。



图一一//东晋江州与D型灶分布

因此，舟形灶似应与楚文化有密切关联，但在楚文化的核心地区江汉平原舟形灶出土数量并不很多，形制上也不典型，更不是主流灶形。陶灶是一种模型明器，是汉文化丧葬礼仪重要的组成部分，最早出现于秦汉文化的核心地区关中，楚地无疑是最早接受这一文化的地区之一，湖北荆州谢家桥一号汉墓^[89]就出土有陶灶，墓中出土器物具有明显的秦文化和楚文化的特征，竹牍纪年为西汉吕后五年（公元前184年），这是目前最早的出土有陶灶的纪年墓，而且是在楚文化的核心区域。与关中地区流行的马蹄形灶不同，江汉平原流行的陶灶却是曲尺形灶，这是关中所不见的，由此也可以看到，楚地接受了主流的秦汉文化，却有明显的地方特点，舟形灶也应是楚汉文化在江淮地区交汇融合下的产物。

三、舟形灶的形制特点及由来

因为形制如船，有人就认为舟形灶的形制是受江南多船的启发出现的，显然有望文生义之嫌。如同舟形灶也被称为鞋形、靴形、腰鼓形一样，只是形似而已。且灶为火具，船却是水上交通工具，水火不相容，对相信阴阳五行的古人来说很难将其联系在一起。同样是模型明器，只把灶做成舟状，而井、仓等其他明器并没有船形，本身也没有道理。而且北方沿海一带亦善操船，南方善舟楫的也非只是江浙一带，比如两广地区，也并不流行舟形灶。

它的形制似船，从其设计上来说可能借鉴了烧造陶瓷的龙窑。典型的舟形灶一般前端小，中部突出，后部尖窄，尾部上翘，与龙窑的形制较为相似。与其他地区的陶灶相比，舟形灶有一个突出的特点：普遍没有烟囱。这一点可能也是受龙窑的启发，与北方窑炉高大的烟囱相比，龙窑的烟囱要短小得多，龙窑窑室拱顶成弧形，截面是半圆形的，且前低后高，窑头横截面小，有利于热量的集中，流速较快，火焰自然上升，使热烟气顺利地沿窑长方向流动。龙窑的中部最大，火焰流速较慢，热能充分，有利于制品烧成；窑尾较小，烟气流速又增大，保证一定的动压，有利于排烟。龙窑一般沿山坡倾斜设置，自然的地势本身就起着烟囱的作用，形成一定的抽力，所以无需烟囱增加抽力。而C型陶灶就是半圆形的，Da型舟形灶的截面大致也是半圆，这在其他形制的陶灶中很少见的，灶身也多见前低后高，尾部上翘，与龙窑的结构有相似之处。

陶灶也是燃烧装置，与陶窑发生联系也非常自然，而且流行区域的重合度也较高。“浙江是汉代瓷业的主要产地……龙窑早在商代时期就已经在浙江地区出现，到了东汉时期已经比较广泛地使用”^[90]。所以这一带流行舟形灶当为情理之中。

总体上来说，舟形灶多见单火眼、双火眼，三眼灶少见。且火眼大小相近，没有主、副之分。早期陶灶多是单眼灶，西汉中期以后，双火眼灶成为主流，而到东汉晚期以后情况有些变化，苏南浙江地区依然流行双火眼灶，而在中原地区单眼灶却卷土重来，这与中原地区盛行的长方形灶的发展是同步的。

舟形灶的灶面少见装饰，常见的只是简单的几何纹饰，如弦纹、网状印纹等，中原与关中地区常见的模印食物和厨具的做法不见于舟形灶，仅有的在灶墙上印树纹的作法也仅限于舟形灶分布的最北限，与中原地区关系紧密的苏鲁皖交界地区。这可能与舟形灶的灶面狭窄有关，火眼以外空余空间不多，不足以安排模印图案，其中C型灶为弧面，亦无从置物。

在中原地区陶灶前端常见的灶墙（或称挡火墙、挡烟墙）在舟形灶中出现得并不多，但其分布却非常有区域特点。B型灶主要见于江南地区，基本不见烟囱和挡墙，但河南地区出土的B型陶灶却出现了烟囱和挡墙。苏鲁皖交界地区出土的C型灶多有灶墙，而在苏南浙北则普遍没有。河南地区、苏鲁皖交界地区舟形灶的特点与中原地区长方形灶的发展也是同步的。

灶墙是为了阻挡燃烧产生的草木灰，以免其落入锅中。一般而言，乔木比草本植物和灌木的灰分低，更适合用来烧灶。但人口众多的北方平原广阔，山林少，植被相对稀疏，木材价格较高。北朝时山东人贾思勰在《齐民要术》记载，栽种榆树，不能做椽及器物的可以拿来卖柴，“一束三文”；栽种柳树，“百树得柴一载（大约是一辆小车的载重）……载直钱一百文”^[91]。对于普通百姓而言，靠购买木柴为燃料做饭，成本还是很高。为经济考虑，多以秸秆、小灌木、细树枝为主要燃料，便宜，但灰分相对较大。南方人口相对较少，而且山林众多，植被茂盛，木材易得，且木材较之秸秆燃烧效率高，燃烧时间长，所以燃料多以树枝、木柴为主（D型灶的灶膛里就经常有大块木材为燃料），灰分相对较小，对灶墙的要求并不突出。加之南方空气湿

润，灰分也扬不起来，而北方空气干燥，本就较高的灰分更容易四处飞扬，为确保食物卫生，所以北方陶灶多有灶墙。

灶墙的出现与时代也有关系，A型灶出现较早，均无灶墙；D型灶出现较晚，一般都有灶墙。江浙一带的B型、C型灶的早期类型，如I式、II式灶不见灶墙，III式开始出现灶墙，而IV式、V式灶却普遍出现灶墙，这也说明随着时代的进步，人们也越来越注意饮食卫生了。

苏鲁皖交界地区的C型灶火眼普遍偏少，多单眼灶，只置釜甑，均陶制。而浙江地区多双火眼或三火眼，灶具常见铜、铁质地，以铁釜为多，亦有铁锅、铁盆之属。

浙江地区出土的B型灶、C型灶在新莽前后有前低后高的变化，且后壁内斜，而其他地区出土的陶灶则无明显变化。

四、舟形灶的传播与流布

以徐州为中心的苏鲁皖交界地区是舟形灶重要的分布地区之一。汉高祖六年（公元前201年），刘邦封异母弟刘交为楚王，拆分故楚国东海郡、彭城郡、薛郡三十六县置楚国，即包括现在的苏北、鲁南、皖北大部。景帝三年（公元前154年），楚王刘戊参加了七国之乱，乱平后，析彭城郡南部置沛郡，以楚国之薛郡置鲁国。汉宣帝地节元年（公元前69年）改为彭城郡，辖境相当于今山东微山、江苏徐州市区、沛县东南部、邳州西北部及安徽淮北以东，郡治彭城。这个区域内出土了A、B、C型舟形灶，尤其是C型灶，出现时代较早，A型灶、B型灶的早期类型也多见于淮河流域。这个区域可能是舟形灶的发源地之一。

但在新莽以后，出现了明显的南移趋势。在考古上的表现是，淮河以北舟形灶出土的数量大减，而江淮乃至江南地区舟形灶出土数量明显增加。到了三国两晋时期，这个进程大大加快，浙江境内出土的C型灶几乎都是这个时期的，而淮河以北已经基本不见舟形灶。这和当时北方移民不断南迁江浙的历史事实密切相关。

《汉书·武帝纪》曾记载，从关东向会稽迁徙灾民^[92]，“其具体迁出地点，是河淮之间的梁、楚旧地”^[93]，便是以徐州为中心的区域。但这个时期的移民数量不多，规模相对也较小。两汉之际，王莽篡汉，中原一度大乱，北方人开始不断南迁。吴郡钱塘人范平，“其先铨（属沛郡，现安徽淮北临涣镇）侯馥，避王莽之乱适吴，因家焉。”^[94]《通志·氏族略》载：“秦有御史大夫钱产，子孙居下邳。汉哀、平间，钱逊为广宁太守，避王莽乱，徙居乌程（在今浙江湖州）。”^[95]

而更大规模的南迁应该是从汉末开始，东汉末期发生的黄巾大起义，席卷黄河中下游的广大地区，徐州所在的苏鲁豫皖交界地区深受其祸；三国的军阀割据纷争，徐州再一次成为战场。为躲避战祸，徐淮地区人民纷纷南迁。西晋的永嘉之乱，导致“幽、冀、青、并、兖州及徐州之淮北流民，相率过淮”^[96]，掀起了中国历史上大移民的第一次高潮。

徐淮地区南渡人士大多聚居於苏南浙江一带，这个地区也是C型灶出土最为集中之地。

江南大姓张氏亦从徐淮地区迁居江南^[97]，东吴孙权的首席谋士张昭，“彭城人也”，因“汉末大乱，徐方士民多避难扬土，昭皆南渡江”^[98]。南朝刘宋的开国之君刘裕也是彭城人，永嘉之乱中其高祖父刘混南渡，“居晋陵郡丹徒县之京口里”^[99]，即镇江东门外寿丘山下。刘裕的皇后也是徐州附近地区人，“孝穆赵皇后，讳安宗，下邳僮人也……孝懿萧皇后，讳文寿，兰陵兰陵人也”^[100]。僮县位于今安徽泗县山头镇潼城村东北，兰陵在今山东枣庄南。

出有B型陶灶的孙吴中晚期薛秋墓^[101]曾出土有上“折锋校尉沛国竹邑东乡安平里公乘薛秋年六十六字子春”字样的木刺，竹邑即今安徽宿州老符离集；江苏镇江谏壁镇曾发现彭城郡吕县司吾令刘庚墓^[102]。吕县故城在江苏徐州铜山区北，司吾县在《水经注》有载：“司吾城，在司吾山东，俗为峒崕。故城在宿迁县北六十里。”镇江东郊京山也出土了原籍东海郡郯县的刘剡墓志^[103]；山东嘉祥出土的《徐之范墓志》^[104]称：徐之范为“汉太尉防之后”，而徐防是“后汉沛国铨人”。徐之范的十二世祖饶

“属汉魏纠纷，避地江表，居东阳之太末（治今浙江龙游）。”^[105]

江北人口大量南迁“不可避免地将中原黄淮流域的埋葬方式带至长江下游一带”，因此，“和鲁南、苏北一带形制和结构比较一致的画像石墓和石室墓，在东汉晚期长江下游的个别地点也有发现”^[106]。而这些画像石墓中也出土了C型陶灶^[107]，也从一个侧面证明了墓主与苏北的关联。

在大迁徙中，也有部分徐淮地区的移民移居江西、湖北等地区，“永嘉中，（华轶）历振威将军、江州刺史……轶在州甚有威惠，州之豪士接以友道，得江表之欢心，流亡之士赴之如归”^[108]。“大难（指苏峻之乱）之后，纲纪弛顿，自江陵至于建康三千余里，流人万计，布在江州”^[109]，虽未明言流人来自何处，但数以万计的流人必然包括徐州流民。江西南昌东吴高荣墓^[110]中出土有木简，其文曰：“弟子高荣再拜问起居沛国相字万绶”，墓主高荣即是沛国相县（今安徽淮北）人。而湖北新洲月亮塘西晋墓^[111]出土的墓砖上刻有“太康元年下邳□□舍人徐”的字样，墓中即出土有C型舟形灶。

D型灶主要分布在现江西、福建境内，在六朝时基本上属于江州所辖，D型灶出土地点也多在人口集中的郡治及主要城市周边（图一一）。“太康十年（289年）……（十一月）甲申……（以）濮阳王允为淮南王，都督扬、江二州诸军事（按：惠帝元康元年，有司奏荆、扬二州，疆土旷远，统理尤难，于是割扬州之豫章、鄱阳、庐陵、临川、南康、建安、晋安，荆州之桂阳、安成、武昌，合十郡，置江州）。”^[112]其管辖区域大致在现在的江西和福建境内。其后江州的管辖区域虽有调整，但在整个六朝期间变化并不大。在相同时代的同一个行政区域，具有相似的文化传统和社会习俗也合情合理。

但具体到江西和福建地区，情况又有所不同。江西地区流行的主要是Da亚型灶，这应该是受广州地区的影响。东汉晚期，Da亚型灶出现于广州，一直延续到两晋时期，南朝时则在江西大量出现，且基本上沿赣江分布。而赣江是广州和江西之间最重要的交通要道。秦时“所通越道”路径主要有四^[113]，其一就是从江西南部溯赣江支流章江越大庾岭的横浦关（今广东南雄小梅关西）达浈水入北江。汉武帝灭南越时，“主爵都尉杨仆为楼船将军，出豫章，下横浦”^[114]走的就是这条线路。清朝历史地理学家顾祖禹认为：“自南昌以南诸郡之水悉合于赣水，而委输于鄱湖。地势南高而北下，上流之重恒在南方，故岭峽发难，赣江上下千里之间皆为战地，振古如兹矣。”^[115]江西地区汉墓曾出土很多典型岭南风格的器物，如新余西汉墓出土的喇叭口壶^[116]、南康西汉墓^[117]和南昌东郊M15出土的硬陶甗^[118]、湖口永初七年墓出土的横耳四系罐^[119]等，就曾广泛流行于岭南地区，很可能就是岭南地区输入的产品。

自汉以后，自岭南至六朝都城建康多由此途。义熙五年（409年），刘裕伐慕容超，“（广州刺史卢循）乃率众过岭，是月，寇南康、庐陵、豫章，诸郡守皆委任奔走”^[120]。败退时，“循于左里（今江西都昌县左蠡镇）奔走，而众力犹盛，自岭道还袭广州”^[121]。侯景之乱时，陈霸先自广州越岭北上勤王，“发自始兴，次大庾岭……进顿南康”^[122]；梁太平元年“二月庚午，萧勃举兵，自广州渡岭，顿南康……至于豫章”^[123]，走的也是这条通道。

因此可以认为，江西地区出土的Da亚型灶应该来自广州。

而福建情况有所不同，福建地区出土的主要是Db亚型灶。陶灶为典型的汉式器物，终汉之世，僻远的福建地区极少发现陶灶。六朝以后，随着汉人的不断迁入，陶灶出土的数量逐渐增多起来。东吴永安三年（260年），孙权将会稽南部都尉改为建安郡（治建安，现建瓯），析建安郡侯官县地置东安县（治在今福建南安丰州），这应该是人口迁入的表现，“只有当中原移民在甘地已经聚居了相当数量的人口，并且土地已经垦殖以后，当局都会以建立一个新县的方式认可这一地区的开发。”^[124]太康三年（282年），西晋政府以建安郡东部为晋安郡，治侯官（今福州），隶江州，改东安县为晋安县。

福建在地理上与江西、浙江相邻，但其僻在海隅，开发相对较晚。孙吴政权一度将福建作为犯罪官员的流放地，吴主孙亮废后，“黜为侯官侯，夫人（全氏）随之国，居侯官”^[125]，吴主孙皓将“诸父与（孙）和相连及者，家属皆徙东冶（即侯官）”^[126]。魏遣吴国寿春降将徐绍来吴下书，为孙皓所杀，“徙其家属建安”^[127]；左丞相陆凯因为“数犯颜忤旨”，在他死后，孙皓“竟

徙凯家于建安”^[128]。而会稽太守郭诞因未揭发临海太守奚熙的“妖言”，被“送付建安作船”^[129]。

正是因为其地处偏远，福建成为逃亡或避难之地。西汉景帝平定七国之乱，吴王子子华、子驹便“亡走闽越”^[130]；建安元年（196年），孙策起兵攻会稽郡，太守王朗“奔东冶，侯官长商升为朗起兵”^[131]；“元嘉初，上虞孙溪奴多诸幻伎，叛入建安治中”^[132]。

除了逃亡以外，饱受战乱之苦的中原移民也选择了相对安定的福建作为栖身之所。美国学者毕汉思从地方行政区划的设置过程，考察了这些移民到达福建的路线：“中原移民沿着钱塘江上溯，经其两岸的沃土转入支流的河谷。公元191至195年，有两个新县在金华江上出现。还有一些移民沿着官溪上行……浙闽界上的一道隘口充当了进入福建南浦溪上游的通道……于是首批移民沿着江山港上行，穿过上述隘口，由北边进入福建，随之三个县城被置于南浦溪畔，这些县的设置至迟不过公元204年，也许就紧接着196年以后。部分移民从南浦溪转入崇溪。稍后，公元205年时在崇溪畔也建立了一个新县。”^[133]在浙江和福建政和、建瓯、福州均出土了一定数量的Da亚型I式灶，在建瓯还出土了浙江地区非常流行的C型III式舟形灶，这说明以建瓯为中心的闽北地区正是浙江移民向福建迁移的道路。

还有一条进入福建的通道在江西，“公元257年，江西的抚河及其支流同时设置五个县城。东江的源头已经靠近福建边界，此处有一个富屯溪的宽阔隘口。这个隘口是移民的又一个通道。中原移民沿着富屯溪下行直到金溪口，然后折向西行，沿金溪上溯。接着，在260年就有两个县城（昭武、将乐）分别在富屯溪和金溪岸边出现”^[134]。

葛剑雄也认为，“除了地方行政官员等人外，（福建的）移民都是由相邻的浙江、江西就近迁入的平民”^[135]。福建泉州北峰南朝墓曾出土Db亚型灶^[136]，发掘者认为墓主就是迁居的汉人。

建瓯、政和等闽北地区既出有Da亚型灶，又出有Db亚型灶，似乎也说明了入闽移民来自不同方向。政和松源南朝宋元嘉十二年墓（435年）的青瓷盏与上林湖同期遗存标本^[137]相同，建瓯南朝墓出土了刻划莲花纹的五盅盘^[138]，在江西丰城罗湖窑^[139]也发现了同类器物标本。建瓯东峰六朝墓地^[140]出土的青瓷盘口壶、双唇罐、钵、盅，铁鼎、铁剪，滑石猪以及莲瓣纹装饰，显然受到了以南京为中心的长江下游地区墓葬文化的影响。而墓室中较多使用砖柱的做法，又与赣江地区的文化有密切的关系。

也正是因为山高路远，福建地区的移民在整个六朝期间不过是“缓慢的推进”，据葛剑雄估计，“西晋以后的移民及其后裔肯定不足十万，大概只有六七万”，所以直到唐初，福建也只有三州十县的行政设置。也可能因为这个原因，其丧葬风俗相对稳定，Db亚型灶在唐代还很常见，在有些地区甚至延续到了宋代。

参考文献：

[1] 衢州博物馆：《衢州汉墓研究》，文物出版社2015年，第95页。

[2] 江苏常州博物馆：《江苏常州兰陵恽家墩汉墓发掘简报》，《南方文物》2011年第3期。

[3] 安吉县博物馆：《浙江安吉县上马山西汉墓的发掘》，《考古》1996年第7期。

[4] 刘波：《浙江地区西汉墓葬的分期》，《南方文物》2000年第2期。

[5]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浙江省湖州市杨家埠古墓发掘报告》，《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学刊》第7辑，杭州出版社2005年。

-
- [6]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浙江省杭州市老和山汉墓发掘报告》，《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学刊》第7辑，杭州出版社2005年。
- [7]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杭州大观山果园汉墓发掘简报》，《浙江汉六朝墓报告集》，科学出版社2012年。
- [8]安徽省考古研究所等：《安徽泗县前李墓地发掘简报》，《华夏考古》2015年第3期。
- [9]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奉化白杜南岙林场汉六朝墓葬》，《浙江汉六朝墓报告集》，科学出版社2012年。
- [10]南京市博物馆：《南京市东汉建安二十四年龙桃杖墓》，《考古》2009年第1期。
- [11]湖州市博物馆：《湖州小塔山汉代砖室合葬墓发掘简报》，《浙江汉六朝墓报告集》，科学出版社2012年。
- [12]衡阳市文物处：《湖南衡阳市兴隆村两座东汉砖室墓》，《考古》2010年第4期。
- [13]程亦胜：《浙江安吉天子岗汉晋墓》，《文物》1995年第6期。
- [14]奉化县文管会等：《奉化白度汉熹平四年墓清理简报》，《浙江省文物考古所学刊》，文物出版社1981年。
- [15]邱宏亮：《安吉高禹发现东汉熹平五年纪年墓》，《东方博物》总第38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
- [16]镇江市博物馆等：《江苏丹阳东汉墓》，《考古》1978年第3期。
- [17]德清县博物馆：《浙江德清武康新龙黄泥墩汉墓群发掘简报》，《东方博物》总第65辑，中国书店2017年。
- [18]朱土生：《浙江龙游县东华山汉墓》，《考古》1993年第4期。
- [19]杭州市文物考古所等：《余杭义桥汉六朝墓》，文物出版社2010年。
- [20]杨金东：《余杭义桥汉墓研究》，《杭州文博》2014年第1期。
- [21]同[4]。
- [22]嵊县文管会：《浙江嵊县大塘岭东吴墓》，《考古》1991年第3期。
- [23]鄂城县博物馆：《湖北鄂城四座吴墓发掘报告》，《考古》1982年第3期。
- [24]安徽省文物工作队：《安徽南陵县麻桥东吴墓》，《考古》1984年第11期。
- [25]南京市博物馆等：《南京仙鹤山孙吴、西晋墓》，《文物》2007年第1期。
- [26]常州市博物馆等：《江苏金坛县方麓东吴墓》，《文物》1989年第8期。

-
- [27]崔太金：《萧山三国永安四年墓》，《东方博物》总第42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年。
- [28]金华地区文管会：《浙江常山县何家西晋纪年墓》，《考古》1984年第2期。
- [29]南京市博物馆：《南京市郭家山东晋温氏家族墓》，《考古》2008年第6期。
- [30]东南大学艺术学院等：《南京淳化咸墅南朝罗氏家族墓地发掘简报》，《文物》2019年第10期。
- [31]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灵璧县大李墓群发掘简报》，《文物研究》第12辑，黄山书社2000年。
- [32]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安徽灵璧县孟山口战国西汉墓群发掘简报》，《文物研究》第20辑，科学出版社2013年。
- [33]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安徽淮北相山渠沟墓群M50发掘简报》，《东南文化》2018年第6期。
- [34]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安徽萧县张村汉墓发掘简报》，《江汉考古》2000年第3期。
- [35]谢克仁：《宿州市夹沟镇尖山古墓清理》，《文物研究》第11辑，黄山书社1998年。
- [36]王耐霜：《安徽固镇县圩里古墓群初步研究》，安徽大学硕士论文，2014年。
- [37]聊城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山东阳谷县吴楼一号汉墓的发掘》，《考古》1999年第11期。
- [38]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庐江汉墓》，科学出版社2013年，第314页。
- [39]衡阳市文物工作队：《湖南衡阳市郊新安乡东汉墓》，《考古》1994年第3期。
- [40]襄樊市博物馆：《襄樊杜甫巷东汉、唐墓》，《江汉考古》2000年第2期。
- [41]襄樊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襄阳城东街汉晋墓地发掘简报》，《襄樊考古文集》，科学出版社2007年。
- [42]南京市博物馆等：《南京江宁上坊孙吴墓发掘简报》，《文物》2008年第12期。
- [43]同[23]。
- [44]湖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武昌莲溪寺东吴墓清理简报》，《考古》1959年第4期。
- [45]南京博物院：《江苏溧阳孙吴凤凰元年墓》，《考古》1962年第8期。
- [46]同[13]。
- [47]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杭州地区汉、六朝墓发掘简报》，《东南文化》1989年第2期。
- [48]嵊县文管会：《浙江嵊县六朝墓》，《考古》1988年第9期。

-
- [49]徐定水、金柏东：《浙江平阳发现一座晋墓》，《考古》1988年第10期。
- [50]临安市文物馆：《临安小山弄西晋纪年墓发掘简报》，《东方博物》总第31辑，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年。
- [51]南波：《江苏句容西晋元康四年墓》，《考古》1976年第6期。
- [52]张志新：《江苏吴县狮子山西晋墓清理简报》，《文物资料丛刊》第3辑，文物出版社1980年。
- [53]南京博物院：《江苏江宁县张家山西晋墓》，《考古》1985年第10期。
- [54]南京市文物保管委员会：《南京板桥镇石闸湖晋墓清理简报》，《文物》1965年第6期。
- [55]南京市博物馆：《南京殷巷西晋纪年墓》，《文物》2002年第7期。
- [56]南京市文物保管委员会：《南京迈皋桥西晋墓清理》，《考古》1966年第4期。
- [57]沈作霖：《浙江绍兴凤凰山西晋永嘉七年墓》，《文物》1991年第6期。
- [58]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富阳步桥乌龟山六朝墓发掘报告》，《东方博物》总第60辑，中国书店2016年。
- [59]南京市博物馆：《南京狮子山、江宁索墅西晋墓》，《考古》1987年第7期。
- [60]金华地区文管会：《浙江金华古方六朝墓》，《考古》1984年第9期。
- [61]南京博物院等：《江苏邳州煎药庙西晋墓地发掘》，《考古学报》2019年第2期。
- [62]南京市博物馆等：《南京隐龙山南朝墓》，《文物》2002年第7期。
- [63]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嵊州市祠堂山汉六朝墓葬发掘简报》，《东方博物》总第47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3年。
- [64]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等：《广州汉墓》，文物出版社1981年，第417页。
- [65]高至喜：《长沙东汉墓出土低温铅釉陶建筑模型明器研究》，《湖南省博物馆馆刊》第七辑，岳麓书社2010年。
- [66]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考古组：《广州沙河顶西晋墓》，《考古》1985年第9期。
- [67]福建博物院：《政和县凤凰山六朝墓第二次考古发掘简报》，《福建文博》2013年第4期。
- [68]薛翹：《赣县南朝齐墓》，《江西历史文物》1982年第4期。
- [69]清江县博物馆：《江西清江经楼南朝纪年墓》，《文物》1987年第4期。
- [70]杨后礼：《江西永修南朝梁墓》，《考古》1984年第1期。

-
- [71]许清泉：《福建建瓯木墩梁墓》，《考古》1959年第1期。
- [72]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江西吉水房后山隋代墓葬发掘简报》，《文物》2014年第2期。
- [73]福州市文物考古工作队：《福州翠湖山庄南朝墓清理》，《福建文博》2005年增刊。
- [74]泉州市文物保护研究中心：《泉州北峰南朝墓清理简报》，《福建文博》2005年第2期。
- [75]泉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等：《福建惠安县曾厝村发现两座隋墓》，《考古》1998年第11期。
- [76]泉州市博物馆等：《晋江市内坑吕厝唐墓发掘简报》，《福建文博》2011年第2期。
- [77]泉州市博物馆等：《晋江紫帽园坂村唐墓清理简报》，《福建文博》2018年第2期。
- [78]林存琪：《福建永春金峰山唐墓》，《福建文博》1983年第1期。
- [79]福州市文物考古工作队：《福州市仓山区万春一三区唐墓发掘简报》，《福建文博》2014年第3期。
- [80]厦门市博物馆：《福建安溪后垵唐墓清理简报》，《福建文博》2005年第4期。
- [81]王振镛：《福清发现千年古墓》，《福建文博》1998年第2期。
- [82]张承忠：《永安市发现的宋代陶瓷炉灶和谷仓》，《福建文博》2003年第2期。
- [83]郑辉：《福建六朝考古的发现与研究》，《福建文博》2008年第4期。
- [84]余静：《两汉墓葬出土陶井的考古类型学研究》，《东南文化》2013年第4期。
- [85]韦正：《六朝墓葬的考古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202页。
- [86]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秦汉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470页。
- [87]汉·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82年，第3267-3268页。
- [88]汉·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第28页。
- [89]荆州博物馆：《湖北荆州谢家桥一号汉墓发掘简报》，《文物》2009年第4期。
- [90]中国硅酸盐学会：《中国陶瓷史》，文物出版社1998年，第130-131页。
- [91]北魏·贾思勰：《齐民要术》，中华书局1956年，第65、68页。
- [92]同[88]，第178页。

-
- [93]辛德勇：《汉武帝徙民会稽史事证释》，《历史研究》2005年第1期。
- [94]唐·房玄龄：《晋书》，中华书局1974年，第2346页。
- [95]宋·郑樵撰、王树民点校：《通志二十略》，中华书局1995年，第150页。
- [96]南朝梁·沈约：《宋书》，中华书局1974年，第1038页。
- [97]同[96]，第1509页：茂度“吴郡天人，张良后也……良七世孙为长沙太守，始迁于吴。”而张良汉初以功封留（今江苏沛县东南的微山湖区）侯，族居于此。
- [98]西晋·陈寿撰、南朝宋·裴松之注：《三国志》，中华书局1982年，第1219页。
- [99]同[96]，第1页。
- [100]同[96]，第1280页。
- [101]南京市博物馆：《南京大光路孙吴薛秋墓发掘简报》，《文物》2008年第3期。
- [102]镇江市博物馆：《江苏镇江谏壁砖瓦厂东晋墓》，《考古》1988年第7期。
- [103]镇江市博物馆：《镇江东晋刘剋墓的清理》，《考古》1964年第5期。
- [104]嘉祥县文物管理所：《山东嘉祥县英山二号隋墓清理简报》，《文物》1987年第11期。
- [105]南朝宋·范晔：《后汉书》，中华书局1965年，第1500页。
- [106]黎毓馨：《论长江下游地区两汉吴西晋墓葬的分期》，《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学刊》，长征出版社1997年。
- [107]a. 南京市博物馆：《江苏高淳固城东汉画像砖墓》，《考古》1989年第5期；b. 镇江博物馆：《江苏省高淳县东汉画像砖墓》，《文物》1983年第4期。
- [108]同[94]，第1671页。
- [109]同[94]，第2114页。
- [110]江西省历史博物馆：《江西南昌市东吴高荣墓的发掘》，《考古》1980年第3期。
- [111]王善才、胡金豪：《湖北新洲旧街镇发现两座西晋墓》，《考古》1995年第4期。
- [112]同[94]，第462-463页。
- [113]王元林：《秦汉时期南岭交通的开发与南北交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8年第4期。

[114]同[87]，第 2975 页。

[115]清·顾祖禹：《读史方輿纪要》卷八三“江西一”，中华书局 2005 年，第 3885 页。

[116]新余市博物馆：《江西新余发现西汉墓》，《南方文物》2005 年第 4 期。

[117]南康县文化馆：《南康县清理一座西汉墓》，《江西历史文物》1984 年第 2 期。

[118]江西省博物馆：《南昌东郊西汉墓》，《考古学报》1976 年第 2 期。

[119]杨赤字：《湖口县象山东汉纪年墓》，《江西历史文物》1986 年第 1 期。

[120]同[96]，第 18 页。

[121]同[96]，第 1435 页。

[122]唐·姚思廉：《陈书》，中华书局 1972 年，第 4 页。

[123]同[122]，第 12 页。

[124][美]毕汉思(Hans Bielenstein)：《唐末以前福建的开发》，载《历史地理》第五辑，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第 238-291 页。

[125]同[98]，第 1201 页。

[126]同[98]，第 1165 页。

[127]同[98]，第 1164 页。

[128]同[98]，第 1403 页。

[129]同[98]，第 1170 页。

[130]同[87]，第 1916 页。

[131]同[98]，第 1377 页。

[132]刘宋·刘敬叔、黄益元点校：《异苑》，《汉魏六朝笔记小说大观》，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9 年，第 681-682 页。

[133]同[124]，第 238-291 页。

[134]同[124]，第 238-291 页。

-
- [135]葛剑雄：《福建早期移民史实辨正》，《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5期。
- [136]泉州市文物保护研究中心：《泉州北峰南朝墓清理简报》，《福建文博》2005年第2期。
- [137]慈溪市博物馆编：《上林湖越窑》，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108页。
- [138]卢茂村：《福建建瓯水西山南朝墓》，《考古》1965年第4期。
- [139]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江西丰城洪州窑遗址调查报告》，《南方文物》1995年第2期。
- [140]厦门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等：《福建建瓯市东峰村六朝墓》，《考古》2015年第9期。